

东吴农业经济的国家政权主导因素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东吴国家政权通过领兵制、赐田复客制和奉邑制,授予将领和文臣土地和劳动力,是国有土地的变种或分割,受东吴国家政权主导因素的影响颇深。地主土地所有制由于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而呈现产权不明晰的特点。东吴国有土地制度仍然占有相当比重。国有土地上国家政权的强大作用,决定了租佃农业劳动者农奴化的境遇。苛重的赋税负担造成社会生态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 东吴; 农业经济; 国家政权主导因素

[中图分类号] K 23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2)06-0073-06

史学界对于东吴农业经济的研究,一般认为东吴政权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扶持,是隋统一前江南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开端。东吴政权一般通过领兵制、赐田复客制和奉邑制等形式实现对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①近年来长沙走马楼东吴简牍的出土丰富了史学界对东吴江南土地制度,特别是国有土地所有制的认识。笔者认为东吴江南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受东吴国家政权主导因素的影响颇深。同时东吴国有土地制度仍然占有相当比重,东吴农业劳动者呈现农奴化趋势。地主土地所有制由于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而呈现产权不明晰的特点。而国有土地上中国家政权的强大作用,则直接决定了租佃农业劳动者农奴化的境遇,以及苛重的赋税负担。

一、东吴政权主导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东吴国家政权通过领兵制、赐田复客制和奉邑制,授予将领和文臣土地,并随土地赐予劳动力,从而确立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东吴部分大地主的土地是国有土地的变种或分割。

有关领兵制、赐田复客制和奉邑制的相关信息如下:

《三国志》卷五十一《吴宗室传》载:

孙皎,“迁都护征虏将军,代程普督夏口。黄盖

及兄瑜卒,又并其军。赐沙羨、云杜、南新市、竟陵为奉邑,自置长吏。”^② [1]1206-1207 (卷五十一·宗室传)

孙韶“拜承烈校尉,统(孙)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县,自置长吏,一如河旧……为边将数十年,善养士卒,得其死力。”^{[1]1216} (卷五十一·宗室传)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载:

(孙)权拜(周)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雋、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1]1264} (卷五十四·周瑜传)

周胤“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1]1265-1266} (卷五十四·周瑜传)

《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载:

(孙权)即拜鲁肃奋武校尉,代(周)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1]1271} (卷五十四·鲁肃传)

《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载:

(孙)权统事,料诸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阴赍赏,为兵作绛衣行滕,及简日,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增其兵。…时蒙与成当、宋定、徐顾屯次比近,三将死,子弟幼弱,权悉以兵并蒙。蒙固辞,陈启顾等皆勤劳国事,子弟虽小,不可废也。书三上,权乃听。^{[1]1273-1275} (卷五十四·吕蒙传)

(吕)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

[收稿日期] 2011-08-30

[作者简介] 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顷。^{[1]1280}（卷五十四·吕蒙传）

《三国志》卷五十五《蒋钦传》载：

（蒋钦）道病卒。权素服举哀，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1]1287}（卷五十五·蒋钦传）

《三国志》卷五十五《周泰传》载：

（周泰）子修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1]1289}（卷五十五·周泰传）

周泰弟周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皆辄料取以充部伍。”^{[1]1290}（卷五十五·周泰传）

《三国志》卷五十五《徐盛传》载：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桑长，拒黄祖。祖子射，尝率数千人下攻盛。盛时吏士不满二百，与相拒击。^{[1]1298}（卷五十五·徐盛传）

《三国志》卷五十五《潘璋传》载：

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1]1300}（卷五十五·潘璋传）

《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治传》载：

（孙）权表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割娄、由拳、无锡、毗陵为奉邑，置长吏。……自令督军御史典属城文书，治领四县租税而已。^{[1]1303-1305}（卷五十六·朱治传）

《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载：

（孙）权奇其能，分丹阳为临川郡，然为太守，授兵二千人。^{[1]1305}（卷五十六·朱然传）

《三国志》卷五十六《吕范传》载：

…拜裨将军，领彭泽太守，以彭泽、柴桑、历阳为奉邑。^{[1]1310}（卷五十六·吕范传）

《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载：

迁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吴、会二郡，鸠合遗散，期年之间，得万余人。^{[1]1312}（卷五十六·朱桓传）

《三国志》卷五十八《陆抗传》载：

（陆抗）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机云，分领抗兵。^{[1]1360}（卷五十八·陆逊传）

以上信息显示，领兵制与奉邑制，均与一定的任职相关。换言之，东吴国家政权授予将领兵员、赐予官员奉邑，都是有条件约定的。将领对其被授

予兵员的隶属关系受到东吴政权的限制，因为这些被授兵的将领，并不能够保证这些兵员在其死后自然由其子孙继承。如凌统死后，“二子烈、封，年各数岁权内养于宫…追录统功，封烈亭侯还其故兵。后烈有罪免，封复袭爵领兵”，^{[1]1297}（卷五十五·凌统传）说明凌统的亲兵继承与否取决于君主孙权的态度和凌统后代的政治表现。因此东吴将领一方面需要向东吴君主证明自己具备领兵的资质，如吕蒙不得不“蒙阴赍赏，为兵作绛衣行滕”以博得孙权对其领兵资格的认可；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感情和物质投资换取被授予兵员对自己的政治忠诚，如孙韶“为边将数十年，善养士卒，得其死力。”孙奂需“命部曲子弟就业”以安抚人心。^{[1]1208}（卷五十一·宗室传）陈表也须“家财尽于养士”。^{[1]1290}（卷五十五·陈武传）甘宁以“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闻名。^{[1]1294}（卷五十五·甘宁传）从周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来看，东吴将领所受兵员，其所有权本属于“官”即东吴国家，所以兵员的授予便是对国有土地上劳动力的分割。另外，东吴的部曲还有一定收入。如朱据的部曲“应受三万缗”。从“典校吕壹疑据实取”^{[1]1340}（卷五十七·朱据传）而欲诬告朱据的情节来看，似乎不是由朱据本人支付。或许为东吴政权支付，归朱据支配。

奉邑制更是与官员的具体行政任务相关。如周瑜和朱治都是由于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而享有奉邑，具有官员俸禄的意义。奉邑不能世袭，却可以转移。如鲁肃“代（周）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人，奉邑四县，皆属焉”，说明周瑜所领兵员和奉邑均在周瑜死后转移给鲁肃。至于享有奉邑的军政官员有权自行任命吏员，如“（孙河）后为将军，得自选长吏，表掾为曲阿丞，迁为长史”，^{[1]1339}（卷五十七·吾粲传）则不过是秦汉以来地方行政的惯例。

将领被授兵，往往与东吴时代一项重要的内政平服山越密切相关。将领一旦被授兵，其政治前途便取决于完成征服山越，为东吴政权争取劳动力的效果。成功完成这项任务的将领可以与国家分割

① 如唐长孺先生认为，南方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不同于北方，“江南的国家没有掌握这么多的无主荒地，公社残余正在衰落，因此江南农业发展的途径只能是通过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田园别墅组织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国家”。参见氏著：《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另参见：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赵昆生：《孙吴世袭领兵制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等。

② 文中标注参考文献^[1]的均出自陈寿《三国志》，具体卷、传见所引内容后的括号内。

所获得的劳动力,并将其精壮者充作部曲。^①陆逊平定丹阳山越,“遂部伍东三郡,疆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1]1344}(卷五十八·陆逊传)全琮被孙权授以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因开募召,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1]1381}(卷六十·全琮传)诸葛恪平定丹阳四郡叛乱后,“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1]1431-1432}(卷六十四·诸葛恪传)以上诸授兵情况,东吴政权或以具体军事任务作为授兵条件,或作为军事行动胜利后的奖赏而授兵,不但充分说明东吴国家政权的主导地位,而且授兵后都落实到“屯”即农耕上。既然东吴政权授兵给将领,主要以对内对外军事任务为根据,致力于士兵和土地的结合,因此颇类似北方曹魏的屯田制。曹魏屯田同样也是士兵和土地的结合。只不过曹魏政权的屯田依靠专职屯田官吏管理,而东吴则把权力下放给将领,条件自然是将领可以与国家分割屯田兵员的劳动。事实上,东吴统治者下放权力给将领,一方面可以调动将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东吴朝廷的行政成本。孙皓天册元年(275年)就因为欲“科实广州户口,马兴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合聚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1]1172}(卷三十八三·嗣主传)激起叛乱,正是因为触犯到地方将领这方面的利益,反而增加了国家的行政成本。^②

只有赐田复客制,由于东吴政权在赐予土地的同时,连同附着其上的劳动力作为免除国家义务的复客同时赐予,因此具有从国有土地所有制向地主土地所有制分割和产权转移的意义。但是零星史料无法证明其在东吴时代的重要经济地位。相反在东吴时代,土地私有观念淡薄。如钟离牧“少爱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临熟,县民有识认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县长闻之,召民系狱,欲绳以法,牧为之请。长曰:君慕承宫,自行义事,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何得寝公宪而从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缘君意顾,故来暂住。今以少稻而杀此民,何心复留?遂出装,还

山阴,长自往止之,为释系民。民惭惧,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还牧,牧闭门不受。民输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发名。”^{[1]1393}(卷六十钟·离牧传)拥有土地产权的“县民”本有权利申明对收获物的分割权,却几乎获狱。在县长看来,道德境界远比土地产权重要。

二、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莠所见东吴土地国有制

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莠,充分体现了东吴土地国有制的一般情况。简牍信息显示,东吴国有土地上的劳动者有男、大女、郡吏、军吏、州卒、县吏、复民、郡卒、士、丞十种身份。现分别例举如下以做分析:

下伍丘男子五将,田七町,凡卅亩,皆二年常限。其二十六亩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四亩,亩收米一斛二斗,为米四斛八斗。亩收布二尺。其米四斛八斗,四年十一月五日付仓吏* *。凡为布三丈一尺八*寸六分(二丈五尺一寸六分)。四年十一月六日付库吏潘有。其旱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九百六十二钱(一千二百四十二钱),四年十一月四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曹吏……四/七^③[2]73

下伍丘郡吏周柏,田卅二町,凡一顷六十四亩,其九十六亩皆二年常限。其八十三亩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 *亩,亩收税米一斛二斗,为米十五斛六斗。亩收布二尺,其六十八亩余力亩。其六十一亩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七亩,亩收米四斗五升六合,为米三斛一斗九升二合,亩……。其米二十斛七斗九升二合,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付仓吏郑黑。凡为布……五尺七寸八分(三匹一丈五尺四分)。四年十二月付库吏潘有。其旱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六千七百*(二十八)钱。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曹吏……四/九^{[2]73}

下伍丘军吏黄元,田十町,凡二十一亩,皆二年

① 相关研究参见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唐先生认为东吴讨伐山越是以孙氏为首的宗族讨伐其它宗族的战争。川胜义雄则认为这一过程是将率领的私兵色彩的屯田兵建立军政统治的过程。参见氏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② 目前相关研究一般显然低估了东吴政权的主导力量。如川胜义雄认为,“从作为臣下的将军方面来说,这种主从关系始终只是针对自己视之为主人的个人尽忠,并没有扩展到对于主家孙氏一族的关系上”。参见氏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

③ 四/七指嘉禾四年简牍第七号。括号内为应交数额。下同。

常限。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凡为布*丈四尺二寸(一丈三尺八寸六分)……四年十一月五日付库吏潘有。亩收钱卅七,凡为钱七百九十五钱(七百七十七钱)。四年十一月五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曹史…… 四/十九^{[2]74}

(下伍)丘州卒区张,田二十町,凡五十一亩。其二十八亩,皆二年常限。其二十五亩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亩,亩收税米一斛二斗,为米三斛六斗,亩收布二尺。其二十三亩余力田。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其米三斛六斗。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付仓吏李金。凡为布三丈七尺八(六)寸五(八)分,四年十一月八日付库吏潘有。其旱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二千三钱(一千九百八十六钱),四年十一月九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曹史赵野…… 四/二十^{[2]74}

下伍丘县吏张扬,田二十五町,凡五(八)十七亩,其六十六亩,皆二年常限。其五十六亩旱,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亩,收米一斛二斗,为米十二斛。亩收布二尺。其二十一亩余力田,其七亩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四亩,(亩)收米四斗五升六合,为米六斛三斗八升四合。亩收布二尺,其米十八斛三斗八升四合,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付仓吏郑黑。凡为布二匹四尺三寸六分(二匹九尺五寸八分),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付库吏潘有。其旱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五千二钱(四千一十一钱),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曹史赵野…… 四/二一^{[2]75}

上赭丘大女李流,佃田六町,凡卅亩,皆二年常限。旱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凡为布二丈一尺七寸八分(一丈九尺八寸),四年十二月十日付库吏潘有。其旱田亩收钱卅七,凡为钱一千六百卅钱(一千一百一十钱),四年十二月十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三日田(户曹)史赵…… 四/三九^{[2]77}

己酉丘复民五口麦,佃田三町,凡二十九亩,皆二年常限。其二十四亩旱田,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五亩,亩收米五斗八升六合,四年十二月十日付仓吏李金。凡为布二丈六尺一寸四分(二丈五尺八寸四分),五年二月十二日付库吏潘有。其旱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八百八十八钱(一千二百三十八钱),五年二月十日付库吏。四/四二^{[2]77}

石下丘男子区拾,火种田二町,凡六十亩,皆二年常限。亩收布六寸六分。凡为布三丈九尺六

寸,五年闰月十七日付库吏潘有。旱田亩收钱卅七,凡为钱二千二百二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曹史赵…… 四/二十^{[2]98}

穀丘郡卒潘调,佃田二十处,合一顷一十九亩。其二十六亩二年常限。其二十四亩旱,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亩,亩收米一斛二斗,合二斛四斗。亩收布二尺。其九十三亩余力火种田。其五十三亩旱,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十亩,亩收米四斗五升六合,斛加五升,合十九斛一斗五升。亩收布二尺。凡为米二十一斛五斗五升,其二斛四斗税米,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付仓吏郑黑毕。其十九斛一斗五升租米,四年十二月八日付仓吏郑黑毕。凡为布三匹一尺六寸(三匹一丈四尺八寸二分),准入米六斛八升,四年十二月卅日付仓吏郑黑毕。凡旱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五千卅八钱(五千七百八十九钱),准入米三斛一斗五升,四年十二月九日付仓吏郑黑毕。嘉禾五年三月六日,主者吏赵…… 四/四六三^{[2]131}

朴丘士王璞,佃田十町,凡七十五亩,皆二年常限。其十亩熟田,依旧不收钱(布)。其六十五亩旱田,亩收钱六寸六分。凡为布(一匹)二尺九寸,准入米二斛一斗九升,五年二月十日付仓吏潘虑。旱田亩……为钱二千四百(五钱),准入米一斛五斗,五年三月*日付仓吏潘虑。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张…… 四/四九^{[2]135}

首先,东吴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分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两种,每种又分“旱败不收”和“定收”两种情况。前者不收米,只收布;后者不仅收米,而且收布。从各例“其旱田亩收钱三十七,其熟田亩收田七十”推断,“旱败不收”的田即是旱田,“定收”田即是熟田。综合嘉禾四年各例可明显看出,常限田的熟田税米一斛二斗要远远高于余力田的四斗五升六合。至于布的征收,无论常限田和余力田,旱田均收每亩六寸六分,熟田每亩二尺。常限田的租佃期限无论旱田、熟田均为二年,且税米征收额远高于余力田,说明常限田是国有土地租佃者的指定税收负担。至于余力田,相对常限田,由于税米征收额度较轻,可能是由租佃者自愿根据劳动能力认领的租佃田亩,其租约可能相对灵活,不必拘泥于二年定期。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常限田还是余力田,均每亩征收钱,为旱田三十七、熟田七十,说明东吴国有土地的劳动者不仅要交纳实物地租,而且要同时交纳货币地租。这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东吴无

疑是沉重的赋税负担。^①

简牍还反映有火种田、余力火种田。从这种田种也一样分为旱田和熟田来推断,似乎与一般国有土地没有本质区别。特别是其征收额,无论是米还是布、钱,都与未标明为火种田者无根本差别。“火种”或许表示其开垦的初始状态,与其性质无关。

东吴国有土地上的赋税确定于当年年底交清,布、钱入库,米入仓,分别由库吏和仓吏记录在案,次年再由田户曹史复核。

其次,无论是名义上的自耕农男子、大女,还是郡吏、军吏、县吏、丞等吏户,以及郡卒、州卒、士等兵户,其税收负担几乎无差别。这不仅充分说明东吴自耕农的依附化和农奴化,而且说明担任一定行政工作的吏户和固定服役的兵户,也卑微到农奴的境地。因为从嘉禾四年简牍分析,吏员并不因为担任一定行政工作而在赋税方面得到任何优惠。

最后,“复民”在《三国志》等史籍中没有出现过。与之相似的“复客”和“复人”均与赐田相关。如前引“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以及“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均说明“复客”与“复人”是东吴政权国有土地上的劳动者,被国家随土地授予地主,而成为依附劳动者。两者的性质相同,可认定复客就是复人。所“复”者为对国家的义务,其劳动产品归被授予人支配。复民常限田中熟田的征收额只略高于其它身份劳动者的四斗五升六合,但是其它如布和钱的征收额均相同,故不能认定复民地位低于其它身份的劳动者。前文已述,由于东吴国家政权主导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产权并不固定,劳动者归属关系变动的可能性较大。因此笔者推断,走马楼简牍中的复民系由复课或复民身份转化而来。前提是原赐田的主人失去了对赐田上劳动者即复客的支配权,这些复客的身份相应转化为国有土地上的复民。由于他们在所有权关系变动前,名称为复客或复人,因此身份转化后仍然保留复的名称而称为复民,以区别其它身份的劳动者。^②

嘉禾五年较四年在赋税征收细节上有些许变化。例举如下:

利丘丞漫,佃田二十町,(凡)卅八亩,皆二年常限。其一亩旱不收布。定卅七亩,为米四十四斛四斗,亩收布二尺。其米四十四斛四斗,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付三州掾孙仪。凡为布一匹三丈四尺,准入米*斛六斗,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付三州掾孙仪。其旱不收钱。其熟田亩收钱八十,凡为钱二千九百六十,准入米二斛六斗五升,五年十一月十日付三州掾孙仪。嘉禾六年二月二十日,田户曹史张……五/三十一^{[2]201}

林埂丘大男郑导,佃田八町,凡卅二亩,皆二年常限。其十九亩旱不收布。定收十三亩,为米十五斛六斗,亩收布二尺。其米十五斛六斗,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付仓吏张曼周栋。凡为布二丈六尺,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付库吏潘有。其旱田不收钱。熟田亩收钱八十,凡为钱一千(四十)钱,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付库吏潘有。嘉禾六年二月二十日,田曹史张惕校。五/三七一^{[2]208}

简牍信息显示:旱田不再收钱和布。虽然熟田钱的征收额略增加到每亩八十,但是租米仍维持于一斛二斗水平上。这些是东吴政权针对朝野上下要求减轻沉重赋税呼声而做出的微小让步。

通过以上对东吴土地所有制的分析,不难看出东吴国家政权的主导作用。东吴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力始终十分强大。东吴的边境军事屯田作为土地国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在经济生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东吴在皖城的屯田被西晋击破,被“斩首五千级,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践稻田四千余顷”,^[3]足见规模之大。内地屯田的规模也很大。如东吴在溧阳、湖熟、江乘设立典农都尉,在毗陵设立典农校尉管理屯田事务。^[4]东吴政权为控制盐务,设置司盐校尉专门管理;^③还设立司市中郎将管理市场交易。^④从诸葛亮得到时人“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1]1434}(卷六十四·诸葛亮传)的评价看,东吴的关税也十分苛重。

① 东吴时代以货币值浮动为特征的通货膨胀始终困扰着孙权。赤乌九年(246年)孙权表示:“谢宏往日陈铸大钱,方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界其直,勿有所枉。”参见《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附注《江表传》,第1146页。盐成为金属货币的代替物之一。如朱桓死后,孙权“赐盐五十斛以周丧事”。参见三国志卷五十六朱桓传,第1315页。

② 前辈学者对此展开热烈讨论。如高敏先生断定复民并非复客。参见高敏:《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85页。

③ 参见三国志卷三十八三嗣主传,“永安七年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第1161页。

④ 参见三国志卷四十八三嗣主传,“(孙)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第1158页。

地主土地所有制由于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而呈现产权并不明晰的特点。而国有土地上国家政权的强大作用,则直接决定了租佃农业劳动者农奴化的境遇,以及苛重的赋税负担。走马楼嘉禾四年、五年吏民田家别简牒显示,租佃劳动者不仅要交纳劳动产品,而且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比较曹魏屯田民“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1]26}(卷一·武帝纪附注魏书)的标准,东吴国有土地租佃劳动者的沉重赋税俨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孙权也表示:“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1]1144}(卷四十七·吴主传),有意体察民间困顿,督促地方官吏勿伤农时。但是孙权一味强调军事任务的重要性,以搪塞朝野上下对赋税沉重问题的议论。在回答陆逊“宽赋息调”的建议时,孙权强辩:“至于发调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众济。若徒守江东,修崇宽政,兵自足用,何用多为?顾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调,恐临时未可使用也”。^{[1]1133}(卷四十七·吴主传)他虽然也表示:“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其宽诸逋,勿复督课”,但是仍然无可奈何地表示:“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1]1140-1142}(卷四十七·吴主传)东吴赋役的沉重已经威胁到东吴政权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社会生态形成恶性循环。骆统上疏称东吴“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徵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

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1]1335-1336}(卷五十七·骆统传)因此东吴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的高压控制,突出表现为国有土地租佃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境遇的低下。虽然东吴商品经济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但是东吴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劳动者迫于沉重的赋役负担,纷纷弃农从商,整个社会弥漫在浓厚的市井氛围中,势必影响东吴国家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孙权之后的三位君主均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景帝孙休就无奈地承认:“自倾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之然乎”。^{[1]1158}(卷四十八·嗣主传)而北方的西晋则在代魏后迅速解决了国有土地上的屯田民问题,一方面确立大地主所有者的产权,另一方面鼓励原屯田民通过占田成为自耕农。经济制度的变革因而成为西晋灭亡东吴的重要经济因素。

综上所述,东吴国家政权通过领兵制、赐田复客制和奉邑制,授予将领和文臣土地和劳动力,是国有土地的变种或分割,受东吴国家政权主导因素的影响颇深。地主土地所有制由于国家政权的主导性而呈现产权不明晰的特点。东吴国有土地制度仍然占有相当比重。国有土地上国家政权的强大作用,决定了租佃农业劳动者农奴化的境遇。苛重的赋税负担造成社会生态的恶性循环。

[参 考 文 献]

- [1] (晋)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文物研究所,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走马楼简牒整理组.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别[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3]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卷八十晋武帝咸宁四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2552.
- [4] (梁)沈约. 宋书: 卷三十五《州郡志》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030, 1040.

(责任编辑: 闫卫平)